

引 言

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，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，都会有多个中华民族活动的中心在不同的地域产生。由此，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。举其大略 较早时期 即有所谓的中原文化、齐鲁文化、吴越文化、荆楚文化 以及幽燕文化等等。延及近代 则又有所谓的京派文化、海派文化之别。

然而，作为全国的政治、文化中心，在统一帝国时期，则只能有一个。这个中心，现在被通称之为“首都”。只有在多个封建割据政权同时并存的时期，才会有多个政治文化中心分立的现象出现。辽、宋、金、元时期，正是中国历史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的时期，因此，同时也就表现为多个政治文化中心向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归依的过程。

在前此的汉——唐盛世，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，很明显，是在关中的长安（即今陕西西安），其间，虽历经三国及南北朝两次大分裂的时期，而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，其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动。然自唐末五代开始，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明显朝东北方向迁移，而最终定鼎于北京。^①此后，

^① 今北京之名称，辽代称南京或燕京，金代称燕京或中都，元代先后称燕京、中都及大都。直到明初，又称北平。永乐年间始定名北京。

一直延续到近现代，乃至当代，北京始终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，未再有所改变。^①

在成为首都之前，北京地区的历史进程，对全国的影响要远逊于古都长安。而一旦这里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之后，其影响则又是其他任何地区及城市所无法与之相比的。因此可以说，北京在辽、宋、金、元时期，经历了一个从地方军事重镇向陪都、再向首都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。这个转折，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，人口众多的汉族民众一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角，而作为配角的少数民族民众却一直受到极大的歧视。到了辽、宋、金、元时期，北方少数民族，如契丹、女真、蒙古族等，开始在北京地区乃至全国，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，甚至一度扮演了主角。由此可见，这些少数民族在北京地区的历史活动，对使北京转变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

除了 1928—1949 年期间，国民党政府以南京为短期的国都之外。时北京复称北平市。

一、土地与王冠的交易

大多数谙熟中国历史的人，对于“安史之乱”是不会陌生的，它使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转瞬之间变得不堪一击，并由此造成了帝国中央集权对地方势力的失控。而藩镇的割据和反叛，终于导致了唐帝国的崩溃。

其实，“安史之乱”所造成的历史影响，还远远不止于此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往往被当时的人们和后世的史家所忽略，那就是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，由于没有了唐代幽州藩镇军将的重压，其势力遂得以迅猛发展，很快就能与相互厮杀不休的藩镇抗衡。甚至在不久以后，竟成为左右整个地区政局变化的一股强大势力。

唐代末年，幽州藩镇，作为镇慑东北少数民族的主要力量，其首领军帅已经失去了威镇一方的气势，而被一群骄兵悍将象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。从唐宣宗时的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死后，其子张直方被乱军狂卒所驱逐，直到唐朝灭亡的半

个多世纪中，幽州节度使之职，曾十易其人。^①

唐末，被藩镇间割据战争推上幽州节度使之位的刘仁恭，没有得到一天的安稳，便在吞并别人与被别人吞并的争斗中苦苦挣扎。他先背叛了扶持他登上节度使之位的河东藩帅李克用，并击败了前来讨伐的河东军队，获得了自身的独立；而后又向南面扩张，用武力连续攻占了沧州、景州、德州等地方，想要进一步称霸河北地区。

但是，另一个强藩朱全忠却在魏博节镇的求援之下，出劲旅，联手向刘仁恭发动反击，在内黄斩杀幽州精兵数万人。不久，又在魏州大败刘仁恭，尽歼幽州精锐之军。此后，刘仁恭因军力大损，只得再次求救于李克用，以对抗企图吞并幽州的强藩朱全忠。

后梁开平元年（907年），唐王朝灭亡，而幽州藩帅刘仁恭也在这一年丢失了节度使的大位。抢夺其位者，不是别人，而是他的儿子刘守光。时因后梁大军进犯幽州，刘仁恭命其子刘守光率军拒敌。及至后梁军队被击退，刘守光却率军将正在大安山别宫中享乐的刘仁恭囚禁，自己夺得了幽州节度使的大权。

这一变故，又引起了刘守光与其兄刘守文的厮杀。刘守文正驻守在沧州、德州一带，闻听其弟囚父自立，于是率军

张直方被逐后，由乱军所拥立者为周琳。周琳死后，张允伸继任是职。张允伸死后，其子张简会继任，未几被逐，由张公素继任。张公素又被李茂勋所逐。未几，李茂勋又将所夺藩帅之职让与其子李可举。后其部将李全忠又将藩帅之职夺走。李全忠死后，藩帅之职又被其子李匡威、李匡筹互相争夺，直到唐末，李克用攻占幽州，复命刘仁恭为该镇节度使，直至唐朝灭亡。这种争夺节度使职权无休无止的事情，在其他各藩镇亦随处可见。

反攻，双方大战于芦台。刘守文求得后梁朱全忠的支持，而刘守光则被迫向河东强藩李克用求援。双方激战，互有胜负。最后，刘守文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之下，一时大意，遭到刘守光奇兵的袭击，被俘获，使整个局势发生了逆转，兄弟之间的相互残杀才告一段落。

刘守光在囚父害兄的争斗中，军力损失很大，已经没有了独霸一方的实力。但是，他却不自量力，竟于后梁乾化元年（911年）自称大燕皇帝，改年号为“应天”，并出兵进一步向外扩张。这种作法，无疑会招致各路强敌的忌恨，加速自己的灭亡。

不久，河东大军前来进攻，幽州军屡战屡败。刘守光求援于后梁朱全忠，未果，犹作困兽之斗，终被攻破城池，狼狈出逃。又被擒获之后，刘氏父子独占幽州的局面乃告结束。此后，河东李存勖（即后唐庄宗）派大将周德威坐镇幽州，向南，与后梁势力相抗衡；东北面，则又要抵御少数民族契丹部的时常侵扰，战略位置尤为重要。

就在中原藩镇割据混战期间，东北地区的契丹部族却在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。早在北魏时期，契丹族就已分为八部，人畜日增。至唐中叶，其首领楷落受唐王朝册封为恭仁王，立制度，置官属，势力愈强。到唐末，其首领阿保机（即辽太祖）掌有征伐大权，于是，从唐天复元年（901年）开始，出军四处攻略，进一步向外扩张势力。

阿保机先是向相邻的各少数民族部族发动进攻，连破室韦、于厥、奚等部族，以降其部众。然后，再进军中原，攻略河东、代北等地，又攻略蓟北，掠获大批民众，迁徙至东北。到后梁开平元年（907年），正月，阿保机正式登基，

自称天皇帝，建立了一个新的割据政权。以后，至辽太宗会同元年(947年)乃建国号曰“大辽”。

阿保机立国后，继续向外扩张，不断征服相邻各少数民族部众。即位第二年，太祖阿保机就出军攻伐黑车子室韦及乌丸等部族。即位第五年，又亲征东、西奚族，并占有其地，降其部众。神册元年(906年)，又率军亲征突厥、托欢、党项、小蕃、沙陀等各部族，俘获人畜无数。

到天赞元年(924年)，阿保机再次大举亲征党项、阻卜、托欢诸部族，西抵回鹘城，勒石纪功。复遣军翻越流沙，攻拔浮图城，尽降西陲诸部族而还。翌年底，又亲率大军攻略东北强部渤海国，进拔扶余城，又拔忽汗城。天显元年(926年)，改渤海国为东丹国，封太子贝(一作“倍”)为人皇王，以统辖其地。此后，又攻克不服之长岭、安边、郑颉、定理诸府，然后班师。

阿保机在出军征讨长城以北各少数民族部落的同时，并没有放弃对中原地区的攻略。一有机会，他就出师中原，参加各藩镇之间的混战，从中渔利。即位第三年，阿保机曾应幽州军将刘守文之约，出军助攻其弟刘守光。神册元年，又出军攻略朔州、新州、蔚州、武州、妫州及儒州等地。

翌年，阿保机又收纳中原降将卢文进，并在其引导之下，大举出军攻夺幽州，与幽州守军展开激战，自春至秋，长达200余天。及晋王李存勖遣重兵驰援，契丹军队才解围而去。守将周德威在见到援军统师李嗣源后“握手流涕”庆幸自己死里逃生。这次激战，阿保机差一点就夺取了幽

州。

神册六年，阿保机再次利用中原藩镇相互争斗的机会，亲率大军攻入居庸关，分兵大掠于幽州周围的檀州（今北京密云境）、顺州（今北京顺义境）、潞县（今北京通州境）、三河、良乡（今北京房山境）及望都、满城、遂城（今皆在河北境）等地，俘获大批民众，并迁徙于东北各地。此后，契丹军入掠中原的次数越来越多，连年不绝。

天赞元年（922年）春，契丹出军攻略幽州、蓟州等地，并攻占了蓟州。又应镇州军帅张文礼求救，出兵与晋王李存勖之军激战于镇州，大败晋军。同年冬，复出军攻略蓟北各地。翌年正月，攻克辽东重镇平州，擒获守将赵思温、张希崇等，并在此设置了卢龙军节度使，作为经略中原的前哨站。

未几，阿保机又出军攻幽州，拔曲阳、北平等城，然后回师。同年初秋，再攻略燕赵各地。天赞三年，复出军大略于燕南，并尽徙蓟州百姓于辽东各地。这一时期，契丹军队在中原地区的攻略，其主要目的，就是为了掠夺更多的百姓和牲畜，并迁至辽东，而尚未有长期进占中原的奢望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被掠夺到辽东的中原百姓越来越多，他们带来了较之畜牧业生产更为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，使得辽东地区的经济能够迅速发展。而经济的发展，无疑对其文化的进步、军事力量的增长，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特别是在中原藩镇连年混战的局面下，这股迅猛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，就更加不容忽视。

在唐末的割据势力中，实力最强大的，当属朱全忠与李存勖的两个藩镇。他们二人的争斗，直接影响到中原政局的

变化。唐天祐二年（905年），李存勖之父李克用遣使辽东，欲与阿保机结盟，于是相会于云州，称兄道弟，并商定，契丹出军，助李克用共攻幽州藩帅刘仁恭，以报河东军木瓜涧大败之仇。

翌年，朱全忠亦遣使泛海而来，相与结盟。及后梁开平元年（907年），朱全忠弑唐皇而自立为帝，又遣使前来通报。此后，聘使时有往还。两大强藩，对契丹政权的势力尚且敬而畏之，皆欲结为盟友，其他中小藩镇，在与两大强藩的对抗中，也就自然要借重于阿保机的势力，以求自保。

首先向契丹求援者，为镇州军帅张文礼。因其杀主帅自立，而受到晋王李存勖的讨伐。天赞元年（922年）四月，阿保机命大将迭烈率军救援，在镇州与河东军展开激战，大败之。未几，契丹回军，张文礼死后，河东军又大举进攻镇州，破城平叛。

天显三年（928年），又有后唐义武军节度使王都占据定州叛唐，并遣使向契丹求救。辽太宗闻讯，即遣奚军出援，与后唐军队激战于定州，因后唐军队势众，辽太宗复遣契丹精骑前往增援，然皆被后唐军所击败，死伤惨重。王都见大势已去，遂自焚而死。此后数年，契丹与后唐之间，未再出现大规模争战。

到天显十一年时，中原的局势仍在纷扰之中，后唐政权内部出现自相残杀。自后唐明宗李嗣源死后，其子李从厚被杀。潞王李从珂自立为帝，而明宗之婿石敬瑭拥重兵镇守太原，遭到李从珂的进攻，于是遣使向契丹求救，这已经是中原割据势力第三次借助外援以求自保了。然而，这一次的局势，显然已经与前两次有着很大的不同。

首先，是辽太宗对于这次出援行动极为重视，亲率大军，倾巢而出，势在必得。契丹政权之所以如此卖力气，乃是由于石敬瑭在求援时提出的交换条件实在是太诱人了。其一 是向契丹俯首称臣“且请以父礼事之”。^① 其二，则是割让大片北方州郡给契丹，这其中，也就包括有军事重镇幽州。

其次，是后唐政权已经处于四分五裂之中，李从珂与石敬瑭之争，自相残杀，而拥重兵镇守在幽州等地的军帅赵德钧父子，这时不仅无意救援李从珂，而且也想借助契丹的军力，来取而代之，自立为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胜负之局，大致已定。

是年九月，契丹军与后唐军大战于太原城下，后唐军大败，死者万人，契丹军遂进围李从珂于晋安寨。不久，被困的后唐军帅发动叛乱，归降于契丹，后唐政权遂告垮台。取而代之的，就是以“儿皇帝”著称的晋高祖石敬瑭。当然，他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契丹政权相抗衡，无可奈何，只得一一履行曾经许诺的各项条款。

在石敬瑭履行的各项条款中，对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最大的，当属割让北方诸州郡，包括幽州、蓟州、瀛州、莫州、涿州、檀州、顺州、妫州、儒州、新州、武州、云州、应州、朔州、寰州及蔚州，统称为燕云十六州^②。其中，尤以幽州（今北京市）及云州（今山西大同）的战略地位最重要。

^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 279“后唐纪八”。

^② 其地，相当于今北京，以及天津市、河北省、山西省的部分地区。

自古以来，中原的农耕民族与塞外的游牧民族就时常发生冲突，或是游牧民族进掠于中原地区，俘获大批百姓，抢夺牲畜、钱财、布帛等物品；或是中原军队远征大漠，夺得众多牛羊、马驼等畜产。而双方的冲突分界地，就是阻隔草原与中原两地的连绵山脉和荒芜的沙漠。而在没有这些天然障碍阻隔的地方，农耕民族又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，修筑有人为的防御体系（尤以万里长城为其典范），以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。

位于华北平原北部的幽州，正是从长城里面控制各军事要塞的重镇。北面有居庸关、古北口等关隘，只需少量的军力把守，就能够抵御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侵扰。东有喜峰口、山海关，西有紫荆关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南面则是一马平川，有足够的粮食等物资的补给，以保证驻军的日常供应。因此，这里一直就是中原王朝控制东北地区政局的要地。

然而，在石敬瑭用割让土地而获得“儿皇帝”的王冠时，这种战略地位的优势，出现了完全的逆转。幽州的割让，不只是几个州郡的丢失，而是失去了一道易守难攻的重要防线。从此，中原王朝的北部防线，已经无险可守。游牧民族的铁骑，可以长驱直入，纵横千里，而再也没有山脉、荒漠的天然屏障和长城关隘的人为阻隔了。

以前中原王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筑的万里长城，再加上险峻的山脉等阻隔，其作用胜过十万雄师，足以补偿修筑长城所带来的巨大损失。一旦这个重要的防线被冲破，将会给中原王朝防御北部少数民族的侵扰，造成极大的困难，而使其处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境地。此后几百年历史的发展进

程，又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证明了这一点。

会同元年（938年）十一月，当后晋使者赵莹向辽太宗献上燕云十六州的地图之时，双方当然都深深知道这一举动的重大意义。在后晋石敬瑭一方，是出于无可奈何；而在辽太宗一方，则是把一个既成的事实变得更加合法化。因为这时的幽州等大多数被割让的地方，已经是在辽王朝的军力控制之下。即使如此，辽太宗也对之表现出了极大的重视。

作为具体的表现，辽太宗当即下诏，加号其都城为上京，号称临潢府。又加升幽州为南京，号称析津府。而将原来的辽南京（今辽宁辽阳）改称为东京，其辽阳府也改称为东平府。原来作为中原王朝北方军事重镇的幽州，到这时，开始变为游牧政权的一个重要陪都。北京地区的历史，亦由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。

二、高粱河畔，恢复成泡影

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政权，虽然有其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，如后唐政权的内部矛盾的激化等，但是，北方沿边州郡被契丹政权占据，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不断渐进的必然结果。换言之，即使石敬瑭不与辽太宗订立割让条约，燕云十六州也迟早会落入契丹政权的掌握之中。

因为这时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，已经出现了根本的逆转。此前，中原统一王朝集中全国大部分的军力，用于对北方少数民族的镇防，在大多数的时间里，是具有较大的优势。但是，随着中原藩镇割据而导致的唐王朝的覆亡，已经没有统一的王朝来有效组织大批军队对北方少数民族的镇遏，遂使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，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。

而在攻城掠地的混战时期，军力的强弱又最终决定了双方胜负的结局。显然，背叛后唐政权的石敬瑭，其军力是无法与日益强大的契丹政权相对抗的。对于这一点，不仅石敬瑭自己很清楚，而且当时镇守幽州的赵德钧父子也很清楚，其军力不足以对抗契丹的军力。所以，当他没有能得到傀儡皇帝的宝座时，也就十分“明智”地归降到契丹政权的麾下。

然而，也有一些人对于这种军事力量对比的逆转并没有

清醒的认识。当会同五年（942年），后晋“儿皇帝”石敬瑭病死，其子石重贵登基之后，在大将景延广支持下，拒绝向契丹政权称臣，并声称“有十万横磨剑”，可与之一战^①。此后，双方几经激战，互有胜负。然而，至会同九年（946年）十二月，后晋军队主力战败投降，景延广被俘后自杀，晋出帝石重贵被遣送黄龙府，对军力对比的错误判断最终导致了后晋君臣的悲惨结局。

当然，持有这种错误形势判断的中原王朝君臣是大有人在的。他们没有汲取晋出帝石重贵的教训，而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向契丹政权发起挑战。后周末年，周世宗趁辽穆宗昏庸无能、政治腐败之机，率军于显德六年（959年）大举北伐，希望收复被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。是时，辽得幽州未久，中原百姓也多归心于中原政权，故而是一次极好的机会。后周军队连续收复了莫、瀛、易三州，军锋直指幽州。然而，就在此时，周世宗突患重病，这次的收复行动，功败垂成。

未几，后周的帝王宝座被赵匡胤夺去，他又出军，东征西讨，攻灭后蜀、南唐诸国，建立一统大宋王朝，其财力、军力，以及疆域之广阔，都已经远远胜过了五代十国的各割据王朝。作为开国帝王的宋太祖赵匡胤，自然也不会忘记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。因为“天下视燕为北门，失幽、蓟则天下常不安。”^②在他看来，收复失地，只不过是

《资治通鉴》卷283“后晋纪四”。

^② [宋]叶隆礼《契丹国志》卷18“刘六符传”条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。

个时间早晚的问题。然而，在他还没来得及收复燕云十六州时，就与周世宗一样，命归黄泉。

收复失地的重担，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宋太宗的身上。他在太平兴国四年（979年）二月，即调集大军，先向割据太原的北汉政权发动猛攻，经过数月征战，遂将北汉攻灭。宋太宗踌躇满志，乃在手下大将的怂恿之下，向辽朝发动进攻，企图乘胜一举收复燕云失地。然而，经过数月征战的宋军已经十分疲惫，急需要进行休整，以恢复战斗力；而收复失地的举措，也并不象宋太宗手下大臣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。

对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错误判断，再次导致了宋太宗君臣的惨败。同年六月，宋太宗亲率大军数十万，从镇州出发，并调集河北诸州的军械、粮饷，随军备用。十余日后，宋军主力与辽军守将战于霸州城南之沙河，辽军人少败退，易州、涿州等守城军帅，皆归降于宋。未几，宋军主力攻到辽南京（今北京）城下。而这次宋太宗的主攻目标，就是辽南京。在宋朝君臣看来，只要攻克了辽南京，其他被割让的州郡，将会望风归降。

其实，双方的主力军的决战还没有开始。六月底，辽景宗及萧后得到宋军大举进犯南京的消息后，立刻派遣大将耶律休哥及耶律沙等率精骑十万紧急前来救援。至七月初，宋军分四面强攻辽南京城已有十天，而久攻不下。辽军大部队又前来增援，于是双方主力在高粱河畔，才真正展开决战。辽军先以耶律沙部与宋军激战，双方相持至黄昏时刻，耶律休哥及耶律斜轸部突然袭，宋军遂大败。驻守城中的辽军亦乘势出击，扩大战果。

经此高粱河一战，宋军死伤极为惨重，宋太宗狼狈逃跑，仅乘驴车而幸免于被捉。在这次战役中，宋军的兵力要多于辽军，但是，在战役的准备工作方面，过于仓猝，又低估了辽军主力的战斗实力。因此，先是受挫于南京城下，继而又受到辽军骑兵的突袭，阵角大乱，遂溃不成军。辽军乘胜追击，随即收复了被宋军占去的州郡。

高粱河之战的结局，已经明显反映出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优劣。宋军虽然人多势众，经济实力也很雄厚，但是，由于宋朝帝王忌讳武将专权，采取削弱大将权力的方法，导致了宋军整体战斗力的下降，而辽朝军队虽然人数较少，但是骑兵部队十分精悍，机动性又非常强，从而弥补了人数不足的缺点。而且其总体攻击力，是远远超过宋军的。宋太宗只看到自己这一方人数上的优势，而忽略了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，遂犯了重蹈覆辙的错误。

宋雍熙三年（986年）初，因辽景宗死，辽圣宗年幼，承天皇太后执掌朝政，于是宋朝君臣以为“孤儿寡母”容易欺辱，有机可乘，遂再次出动大军，准备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。这一次的北伐，宋廷是经过周密安排的。宋军兵分三路，一路由大将曹彬、崔彦进及米信率领，作为主力，主攻目标仍是辽南京。另一路由大将潘美、杨业率领，作为偏师，出雁门关，攻取云州（今山西大同）等地。而由大将田重进率一军，居中接应，自定州攻飞狐口，然后三路皆会师于辽南京。

宋太宗的战略计划确实很周密，如果能全面贯彻落实，最后的结局将截然不同。但是，宋朝三路大军在相互配合方面，还欠缺默契，从而给了辽军以取胜之机。在开始阶段，

宋军的进攻十分顺利。东路军在大将曹彬的率领之下，一路北上，连克涿州、固安、新城等地。西路宋军也连续攻克冀州、朔州、应州及重镇云州。中路的宋军也一路打败辽军，直取蔚州。形势大好，捷报频传。但是，在这大好形势的背后，已经隐藏着危机，对于这一点，作为收复失地总指挥的宋太宗，是最清楚的。

没过多久，已攻占涿州的宋军东路主力，因为受到辽军的袭扰，粮食供应严重不足，于是主帅曹彬不得不率军后退，到雄州就食。这一作法，本就延误了军机。回师后，因受到宋太宗的约束，不得轻进，以待西路军收复山后之地，然后再合兵共取幽州，遂又拖延了一个月的时间。此时，西路及中路宋军进展仍较为顺利。东路军诸将纷纷请求出战，主帅曹彬于是复率军北上进攻涿州，再克之。

这次收复失地的战役，其胜负的关键完全是在东路军的成败。而曹彬作为主将，统帅大军，全无主见。或是受命于宋太宗，坚城固守；或是受部下将领的鼓动，仓猝出击，时进时退，指挥无方。而他所面对的敌人，已经不是江南腐败的割据王朝，而是骠勇善战的辽军骑兵，焉有不败之理？再次，攻占涿州的宋军已是锐气丧尽，疲惫不堪，而且所带的粮草不多，又不敢再向前进攻。遂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

而这时的辽军，对于宋军的进攻，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，并针对宋军的战略布署，安排了有力的反击计划。辽军大将耶律休哥面对人多势众的宋军，充分发挥己方骑兵出没神速的特长，夜晚出奇兵对宋军进行骚扰，白天则用精兵扩张声势，使宋军处处防备，不能顺利进军。然后，再出军断其粮道。这种战术，极大地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。

到五月初，辽军主力集结到幽州一线，准备对宋朝东路军发动钳形反击。在这一紧要关头，宋东路军主帅曹彬又听信部将卢斌的话，率众后撤，而不是坚守城池，与辽军对抗。当然，这时的宋军将士已然没有了斗志，再加上听说辽军主力即将发动反攻，一下子造成极大的混乱，溃不成军。辽军见状，立刻发动追击，在歧沟关追上溃退的宋军，双方交战，宋军自然一败涂地，死者多达数万人。

辽军乘胜追击，一举收复了被宋军攻占的州郡。宋东路军的惨败，实际上，已经宣告了宋太宗第二次大规模北伐的失败。辽军随即调集生力军，向其他两路宋军发起反击。六月中旬，辽军主力西进，向潘美、杨业所率之宋军发起进攻。宋太宗闻讯，急令两路宋军回师自保，七月初，辽军大败潘美部宋军，并在朔州南面的陈家谷口擒获了号称“杨无敌”的宋朝猛将杨业。先后收复了蔚州、应州、寰州及朔州、云州等山后之地。

经过这第二次北伐的惨痛失败，宋朝君臣才开始认识到辽朝军事力量的强大，以及收复失地的困难。从此以后，虽然仍不断有人谈论收复失地的各种计划，但是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宋朝却再也没有力量组织另一次的大规模北伐行动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倒是辽朝君臣看到了宋朝军力的软弱可欺，从而一再向南发动进攻，以掠夺宋朝境内的民众及牲畜、钱财诸物。

在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失败不久，辽军就曾大举南侵。同年十二月，辽军攻宋瀛州，斩宋军数万及其守将贺令图、杨重进等。未几，辽军又攻陷邢州及深州等地，大掠而还。翌年春天，辽军再次南下，攻陷易州，并大掠于深州及祁州等